

#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姜帆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哈尔滨理工大学 法学院,哈尔滨 150040)

**提 要:**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文章尝试从分析“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区别与关联入手来认识“解释法律”的内涵,观察解释法律活动的现时境况,揭开“解释法律”的面相;秉持“法律是一项解释活动”的整体观念来寻找良善地解释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何以能够顺畅循环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经由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空间间距和心灵间距,最终通过对这些间距状况和存在原因的分析,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中寻觅跨越这些间距的路径。

**关键词:** 解释法律;法律理解;法律解释;法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2)06-0060-04

## 一、问题的提出

“法哲学在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之后,进入了阐释学阶段。”<sup>[1]</sup>卡尔·拉伦茨在其重要著作《法学方法论》开篇提出了现代法学方法论论辩中由“利益法学”到“评价法学”的转向,这个转向实质上就是对法学问题如何进行解释的方法论转向。“除了被评价的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之外,立法者无疑尚须一般的秩序观点(例如在规定法定方式、或确定期限时)、交易上的需求及法安定性的要求。在该当规范脉络中,立法者如何评价不同的利益、需求,其赋予何者优先地位,凡此种种都落实在他的规定中,亦均可透过其规定,以及参与立法程序之人的言论,而得以认识。……法律只界定一般的框架,在个案中法官必须另为评价,来填补框架的空隙。”“对法学而言,其意谓:在许多案件中,法学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做事后审查,一旦法官必须做价值判断时,法学不能提供许多助力。”上述“评价法学”基本观念中“立法者的评价”、“法官必须另为的评价”、“法官必须做价值判断”实质上均为关于法学研究核心论题“法是什么”和“法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和解释,因为评价标准的确立、评价活动的进行本身源于对自然法原则、对法的价值体系建构、对法的伦理道德准则、对法律规范结构分析与评价、对法律语言表达等等的理解。

当代哲学的叙事方式发生了转变:法学是作为理解的学问,法律实践活动中贯穿着不同主体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法律不再是纯粹理性,不再是纯粹的认识对象,而是一种可以被改造、被建构的实践理性;法律人不再是单纯的认识主体,不再是被动的输入法律规则的机器,而是立足于法律之内、生活于法律之中的解释者、经验者与实践者。本文在尝试对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做力所能及的解读的基础上,以之作为分析工具来剖析这样一个问题: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追问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

## 二、解释法律之面相

### (一) 解释法律的内涵

与“解释法律”最为相近的一个词组是“法律解释”,有许多学者以对两者之间区别的阐释作为界定“法律解释”之内涵的角度。陈金钊教授认为,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虽然只是词组

排列组合不同,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sup>[3]</sup>。谢晖教授认为解释法律是探求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法律解释是针对法律的具体规定或与法律相关的具体事宜,因而是一个法学命题<sup>[4]</sup>。两者之间的关联,其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两者语词结构的相似,即由“法律”和“解释”复合而成,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法律解释偏重“解释”的“法律”拘束力,而解释法律偏重对“法律”的“解释”活动;其次,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包含关系,即解释法律作为对法律的分析阐明活动,其外延比较法律解释的范围更为广泛,解释法律包含法律解释活动。解释法律是由多种主体对古今中外一切法律规范、法律行为、法律事实等等法律现象进行分析阐明的活动,而法律解释发生在法院适用法律过程中,主要是法官对同时代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所作的具有直接法律拘束力的分析阐明。

综上,解释法律主要是由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学者等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司法过程中和法学研究中对法律的应然性和实然性问题、法律适用问题、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等进行分析阐明的活动。解释法律可以划分为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两个方面。法律理解的主体主要是立法者和法学学者,而法律解释的主体是司法者,主要是法院和法官;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即如海德格尔所讲,“我们把理解的发展称为解释”<sup>[5]</sup>,法律解释是法律理解的进一步发展形势。两者之间存在着海德格尔认为的解释学的循环,即法律理解是法律解释的准备,法律解释建立在对法律的理解之上,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又是法律理解的前提,现在的法律解释是未来法律理解的先见,而唯有指向解决法律实然问题、有助于现实法律解释活动的法律理解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关系。

### (二) 解释法律的现时境况

结合社会法学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之后一些后现代法学思潮(包括法哲学的解释学转向)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的转向情况,很多法学学者概括出:新近法哲学的研究已经从立法者的法哲学转向司法者的法哲学。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受到质疑,司法者的法律方法研究应受到普遍的重视。这种概括似乎间接显示了现时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的境

况:立法者的法律理解对法律意义的探究作用不大,司法者的法律解释是解释法律活动的研究重点。到底存不存在从立法者的法哲学向司法者的法哲学的转变?哲学解释学影响下法哲学研究中的解释法律活动是否存在对法律解释的侧重偏向?

法学学者解释法律活动的成果在学理上是系统的法学学说和观点,在实践中常常是形成一些立法建议、司法参考或法制改革意见等等。“司法裁判及法学以如下的方式来分配各自的解释任务:后者指出解释上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借此为司法裁判做好准备;前者则将法学上的结论拿来面对个别案件的问题,借此来检验这些结论,并促使法学对之重新审查。”<sup>[6]</sup>立法者解释法律活动的成果表现为各色法典化的法律规范即立法。“法律具有客观的确定内容,但是这个法律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不是立法者赋予的,而是法律人通过法律方法逐步发现和创立的。……法律的文本化、法典化支持了法律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但是,也同时预设了法律的客观性与确定性以及未来法律方法研究的困境。”<sup>[7]</sup>一切法律活动都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活动,对文本化的法律的客观性的怀疑,对法典中的法律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是否相吻合的质疑恰恰连接了解释法律活动的两个方面,使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能够进入解释学上的循环。当立法的客观性与确定性受到质疑,在法律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对法律进行解释之时,司法者对法律的解释便成为法律权威性的支撑,也使文本中的法律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秩序。法律理解主要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关于法律应然性问题的分析阐明,更接近于法治理想模式的文本化构筑;法律解释主要是关于法律实际是什么,关于法律实然性问题的分析阐明,更接近法治实践运行中法的实效的追寻。法律理解促使观念中的法律转变为法律规范文本,而法律解释使文本上的法律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规范,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共同成就了对法律的解释活动,进而成为法律生活的实际参与者。因此,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的视角都在指向法治社会、民主国家的理想,解释法律活动不存在侧重于哪一方面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有效连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的问题,即秉持何种观念和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使两者之间能够顺畅循环,最终良善地解释法律的问题。

### 三、在间距的跨越中解释法律

“解释究竟是一种‘学术’或是一种‘艺术’,这是多余而无益的问题,因为提问的方式根本就错了。如果以‘纯科学性’的学术概念为基础,它就不是一种学术。前已述及,解释程序不是一种单向前进的过程,毋宁是一种对向交互澄清的程序,借此可以确认或扬弃原来预期的意义内涵。这种程序要求一种付出创意的精神工作。就此而论,有如艺术的创作。”<sup>[8]</sup>解释法律需要立法者、司法者、法学学者付出“自由精神”的创意,犹如一门艺术;解释法律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这是一种“赋予法律陈述真理”的学术。作为“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 (一) 跨越时间间距中解释法律

“历史性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sup>[9]</sup>任何活动的进行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之流内开展的,解释法律也不能例外。解释法律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达,也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化、延续和终结的。立法者和法学学者的法律理解与司法者的法律解释的发生在逻辑上讲是存在时间间距的,相较于

现时司法者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的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学学说是立法者和法学学者在过去时段内法律理解的语言表达。立法者的法律理解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立法活动,包括:立法准备,由法案到法,立法完善三大主要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渗透着立法者所处时代人们对法律秩序的预期和需求,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状况,也存在一些立法者不能认知的法律需求盲点或立法者未能预测的法律发展。司法者的司法活动主要表现为其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此过程中司法者运用一系列法律方法来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实。这些法律方法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等。司法者的法律解释主要是针对立法者即成的所立之法的解释,是结合具体案情、具体的法律事实对“法律是什么”的现时阐明。在哲学解释学影响到法学领域之前,法律实证主义者相信: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他们强调法律与价值的分离,实际上就是立法者的法律理解和司法者的法律解释是分离的,司法者的法律解释必须听从于实在法,也就是服从立法者的法律理解,不能参杂任何独立见解。这种任由两者之间时间间距存在的情况导致过去的立法与现实的法律适用只能机械地吻合,致使解释法律活动一派混乱,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裁判的权威性都受到质疑,学界和实务界在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争论不休,不利于法律的发展和法治精神的传播。那么,现在和过去怎样才能顺畅接续,现时的法律解释和历史的法律理解之间的时间间距怎样才能消除呢?

卡尔·拉伦茨是这样阐述立法者的法律理解与司法者的法律解释之间的时间间距问题的:“法律是原创者——企图创设完全或部分的法律规整之——意志的具体化,此中既有‘主观的’想法及意志目标,同时也包含——立法者当时不能(全部)认识之——‘客观的’目标及事物必然的要求。……每个立法者都不能与其时代的法律观及当时的表达方式分离,他同时也面对某些——源自其时代脉络的——法律问题。……法律解释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其今日的规范性意义),而只有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想法,而不是完全忽视它,如此才能确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sup>[10]</sup>实际上,时间距离的存在恰恰为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的开放性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为过去的法律理解是对现在的法律解释之前的法治状况高精度的总结和概括,立法者所立之法为司法者的法律解释设置了如何在具体的法律事实之中适用法律的“前见”,同时司法者在法律解释时又可以从法律理解给定的“传统”中开放出脱离了当时历史环境而显现出来的法律意义。司法者现在的法律解释检验了立法者历史上的法律理解,司法者对法律的阐明为立法者未来的法律理解也预设了无限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哲学解释学中时间性概念跟历史性概念具有同一性。他强调时间的统一性,即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割裂的,三者之间有个统一性;他强调传统在影响着存在者,即此在的过去“走在它的前头”的观点;他强调时间的有终性,即对于此在来说,时间是一个整体<sup>[11]</sup>。我们可以这样结合海德格尔历史性范畴涵义解读跨越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的间距的根本:正视“时间的统一性”,不仅看到现在,同时了解过去,展望未来;正视传统对现时的影响,尊重和重视历史对现在的影响,以整体性来看待时间之流,以开放性的思维保存过去,发展过去。法律规范和立

法活动连接过去的法律理解和现在的法律解释,过去的法律理解和现在的法律解释是统一的,现在的法律解释受到过去法律理解的影响,而过去的法律理解和现在的法律解释发生之后会通过一定途径释放出将来的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每一个理解某物的人,他就在此物中理解他自己。这对于精神科学家也是如此。在他的工作中,从前与今天、他所面对的历史传统与他本人的当前状况交互作用。”<sup>[12]</sup>司法者在法律解释中需要尊重立法者的法律理解“传统”,而立法者需要在司法者的法律解释作出之后以之为未来法律理解的“先见”,在整体性的时间之流中跨越两者之间的时间间距。在解释法律的活动中,一方面要承认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彼此作为对方的“前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它,而是要根据对立法文本和司法裁判的理解不断地修正前见。每一次修正都形成新的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这些新理解、新解释又成为以后法律解释和法律理解的前见,通过这样的方式消除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时间间距是良善地解释法律的第一步。

## (二) 跨越空间间距中解释法律

“此在在本质上就是理解”<sup>[13]</sup>,解释法律是人类在生活世界内对自我本质的探寻,因此解释法律活动体现了立法者、司法者等在法律生活空间内相对自由地探寻法律的意义行为,也可以说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占据了相当的法律生活空间。

从立法者、法学学者探究其所在社会的法律需要,追问法律应该是什么,展现立法意图、阐释法学观点开始,法律理解便拓展了非常广阔的法律生活空间。法律理解通常是经由归纳推理的方式,从众多同类的法律行为、具体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需求中概括出一般性的、抽象的调整同类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的典型表现是各种法典及其中的法律条文,在国家政权的支撑下具有十分广泛的法律效力,即法律上的约束力。例如:国家立法机关经由正当立法程序公布的制定法在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任何空间均具有法律效力。法学学者的学说更是可以在学术研究领域、法律实践领域、普通民众的生活领域流转。总之,法律理解对法律作出阐明和分析的目的是传播普遍的正义,法律理解是一片培育法治精神与法律信仰最广阔的沃土。法律解释的法律生活空间自始便存在一定的受限。首先,法律解释受到抽象的法律规范的限制,因为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指解释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立法文献及其附随情况进行解释,所欲探究和阐明的法律规范之法律意旨。”<sup>[14]</sup>其次,法律解释的对象不仅包括抽象的法律文本,还包括法律事实,整个法律解释的过程是把先于案件存在的法律和当下的法律事实结合起来,通过司法者的解释使相应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发生法律效力。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经由演绎推理的方式,把一般性的、抽象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还原到特殊案件的活动。最后,司法者作为法律解释的主体,其解释活动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案件情况,同时由于秉承“程序正义”的法治精神,司法者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该排除任何法律程序之外的因素的干扰,其目光仅应在案情与法律文本之间流连往复。所以,与法律理解的存在空间相比较,法律解释的法律生活空间相对狭小,而且由于法律解释的直接指向是个案正义,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高低位阶。我们解释法律的基本欲求是使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能够顺畅循环,面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存在的广狭、高低空间

间距,思考如何跨越这样的间距便成为良善地解释法律不可回避的问题。

能够掌控解释法律所占据的法律生活空间中的主体主要是立法者、司法者,虽然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存在空间间距,但是这不能妨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在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的空间之间的循环和沟通。通过对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的流程的分析可知:连接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促使立法者和司法者跨越空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主要是法律文本,既包括立法者所立法律规范,也包括司法者的司法判决书。通过法律文本,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相互的对话,彼此倾听,以法律理解所体现的普遍的正义原则指导法律解释所追求个案正义的实现,以司法者开放性的思维把法律条文融入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活从而更加扩展和丰富。恰如伽达默尔所言“基于人的语言性的解释学转折无论如何都会将我们自己包括在‘相互’之中,而且它同时还包括我们作为人必须学习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不仅相互倾听,而且要彼此听见。这才是所谓的‘理解’。”<sup>[15]</sup>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通过的“对话”过程中,他们都是解释者,都是面对文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者。同时,“本来是解释者应当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但是由于对某一特定文本的理解,可以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解释者。他们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显示出对文本的关注不同、对意义的理解的不同等差异,这样一来,回答关系就颠倒了过来。为了回答问题,解释者必须自己提出问题。这就表现为理解的辩证法。”<sup>[16]</sup>立法者和司法者在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空间往返中是主动的,而且他们的主动行为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的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对话”使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这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得以交流,使这两个世界融为一个新的可能的法律意义世界。也正是通过立法者和司法者相互倾听,积极地走入对方的法律生活空间,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空间间距虽然存在但最终可以跨越。

## (三) 跨越心灵间距中解释法律

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把解释视为一种“学术性的活动,是法学的起点与基础”。依其见解,自由精神活动可以参与法的创造,他认为自由精神活动包含在解释之中,通过自由精神活动我们可以认识法律的真理,运用通常程序可得认识之法律的真理,他也赋予法律陈述真理的概念<sup>[17]</sup>。萨维尼的学说带有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浪漫色彩,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实证分析法学还没有蔚然成风,他的法学学说里还没有受到“法律是一个完美自足体系,国家法律权威至上,一旦公布必须服从”观点的影响。不过,把自由精神活动看做是“认识法律真理”的灵魂家园至今仍然是符合潮流的,因为法治目标的实现首先应该确保在追求法律真理的路上拥有精神活动的自由。“法律是国王”是法治的实质,但是法律的王位是由致力于享受正义与自由的普通民众赋予的。作为法学起点与基础的解释包含着自由精神活动,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解释者的自由精神融汇到对法律的分析 and 阐明之中。立法者的法律理解和司法者的法律解释可以说都是法律人认识法律真理自由精神活动的表现。换句话说,立法者和司法者对法律的分析阐明是一个人类心灵亲近法律、追求正义公理的历程,这个历程里饱含着他们为法律真理的心灵悸动,也激荡着他们陈述法律真理时彼此之间的心灵碰撞。

立法者的法律理解活动是一个追求普遍正义、发现法律真理、创造法律的过程。在此过程里,立法者的自由精神活动也就是他的心灵活动以各种法律价值观的形式注入成文的法律规范——法律文本之中。司法者的法律解释活动是一个追求个案正义、认识法律真理、适用法律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司法者的自由精神活动也就是他的心灵活动以各种法律价值观的形式注入成文的司法判决中。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活动所体现的法律价值观之间是相符合还是相异的?我们尝试以哲学解释学出现之前法哲学观念中司法者作为解释主体针对立法者的法律文本(成文法律规范)的解释为例来回答“作为客体的法律文本承载着立法者在竞争着的价值中所选择的价值、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可直接推定的价值乃至条文的文章所表达的直观价值,这些价值的统一体是客观的,而且是独立的,其不依附于作为主体的法律解释者的价值观。对于主体来说,职业伦理要求其必须以尊重的态度接受文本所释放的单一性价值信息,以‘发现’意义为视角、以逻辑推理为主要方法去忠诚地接近客体。解释者没有义务,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权力对文本施加自己的价值影响,也就是说,不可以去‘创造’意义。”<sup>[18]</sup>这样看来生活在不同时间阶段中、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立法者和司法者表达在法律文本中的价值观以司法者对立法者的服从表现出一种形式上的相符。但是,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哲学解释学影响下的法哲学,“主体(法律文本的解释者)须抵制各种客体外诱惑而正视其命令式的意义期待,使客体(法律文本)在特定时空结构中尽显其无可挑战的权威。然而,有的法哲学家遗憾地发现,这样的图景并非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sup>[19]</sup>由是,在立法者与司法者对法律进行分析阐明时的价值观之间,在立法者的法律理解过程中的心灵活动与司法者的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心灵活动之间是存在间距的。这种间距的存在比较于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时间、空间间距是内在的、更为本质的间距。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能够开放性地融合对方的法律价值观,跨越这种心灵间距与前文论述的跨越时间间距、空间间距结合在一起构筑了全面的、立体的解释法律的良善方式。

跨越心灵间距的关键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彼此开放性地认知对方寻求的法律真理,包容且融合对方的法律价值观。这种心灵间距的跨越首先需要做到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所阐述的“视野融合”。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视野融合,是他们作为解释者的视野与法律文本的视野之间原本紧张关系的消除,原本分离的法律价值观视野和相异立场的相互融合。欲求达到这种融合在于:两者要开放自己的法律文化视野,在不断变动的历史中丰富自己的法律价值观,不固守“一元”法律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幻想;跨越这种心灵间距还需要做到立法者和司法者对待对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或者说是翻译时应秉持“多元价值观”的态度。“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sup>[20]</sup>这样对文本的翻译实质上是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不隐瞒法律文本所体现的价值观与自我法律价值观念的冲突,在冲突中寻找共同点,领会对方的法律体验,形成自己更丰富、更多元的法律价值观。总之,在解释法律活动中,立法者和司法者不仅要尊重彼此的过往、往返对方的法律生活空间,还要主动地走入对方的心灵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做

到良善地分析阐明法律,不断地生成法律意义,智慧地认识法律真理。

#### 四、结 论

“此在在本质上就是理解。”<sup>[21]</sup>理解是人存在的一种本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对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解读。解释法律是人们在理解过程中对法律的体验,对法律意义的发现和创造。作为解释法律的两个方面,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在不同的时间阶段里、不同的空间范围内、不同的自由精神活动领域各自发挥着重要的营造和调整人们的法律生活的作用。因此,追问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寻求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如何顺畅循环,对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面对不可逆转的时间洪流,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要学会彼此尊重,把握对方的传统,带着前见去进行对法律的分析 and 阐明;面对法律生活空间的广狭之维与高低位阶,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要学会主动地对话,真正倾听对方,在良好的沟通中往返于彼此的法律生活;面对自由精神的心灵碰撞,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要在冲突中求同存异,以开放的心态融合对方的视野,形成多元的法律价值观,丰富我们自由的法律精神世界。或许本文对这些间距的分析和对跨越这些间距的方式的回答不够精确、比较模糊、甚至错误,但是相信只要努力不息,在哲学解释学引领的这条开放的、未竟的道路上,法律的真理终会显现。

#### 参考文献:

- [1] 李桂林. 美国法哲学的阐释学转向[J]. 法商研究, 2004 (6): 117—122.
- [2][6][8][10][17][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 195, 195, 199, 196.
- [3] 陈金钊. 法律解释的哲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41.
- [4] 谢晖. 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J]. 法学研究, 2000 (5): 17—29.
- [5][9][13][21][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182, 25, 176, 176.
- [7] 葛洪义. 法律方法的性质和作用——兼论法律的结构及其客观性[C]//葛洪义. 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55—69.
- [11][16]陈嘉明. 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演讲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83, 191.
- [12][15][德]伽达默尔. 杜特. 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 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 金惠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9, 7.
- [14] 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205.
- [18][19]贾敬华. 视域融合的法哲学的现实分析[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 (3): 91—98.
- [20][德]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下卷)[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498.

基金项目: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治视野中的中国行政道歉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 11YJC82011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姜帆(1979—), 女, 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法理学、法哲学、立法学。

责任编辑: 胡政平; 校对: 宁远